

北京图书馆藏石刻叙录

(七)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

3. 石经

所谓石经，是指将整部成套之经书刻之于石者，主要有儒家石经、佛教石经和道教石经三种。

石经的形制，虽各家大体一致，但也小有歧异。儒家石经多碑式，碑首、碑身、碑座皆全；佛教石经则形制较多，碑式类似儒家石经，但碑首多刻有佛像，刻石式类似碑式的碑身，但无碑首与碑座，特式则刻在经幢、摩崖之上。

(一) 儒家石经

儒家石经，是指儒家经典刻之于石者。这些经书的内容，西汉时有《易》、《书》、《诗》、《礼》、《春秋》等五种，谓之“五经”；唐时增加至十二种，谓之“十二经”；宋以后至清朝灭亡，又增至十三种，谓之“十三经”。将这些经书刻之于石者，从汉至清计有七种，即常说的“熹平”、“正始”、“开成”、“广政”、“嘉祐”、“南宋”、“乾隆”等石经。

关于这些石经的情况，历代都有整理研究的著作，尤其是汉、魏两种石经，因石早佚，记载又不一致，所以著述更多。以现代人著作为例，就有张国淦的《历代石经考》（1929年出版）、马衡的《石经词解》、《魏石经概述》等几种。

(1)熹平石经：始刻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完成于光和六年（公元183年），故称“熹平石经”或“汉石经”。其字为当时书法家蔡邕等人用隶书一体写成，故又称“一体石经”。

刻经之缘由，一是当时的书籍主要为简牍和帛书，简牍易脱简，从而使内容残缺，帛书易抄错，从而产生误差，因此要求有范本勘对；二是汉时传经人，各有师说，章句颇有异同，又系通过口传师授而使之延续，错讹较多。所以，到东汉桓、灵之时，经籍已去古久远，文字多谬，诸博士试甲乙科，争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用行贿以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义者。因此，要求有范本以勘定当时经文，成为事所必然。但这时还不知印刷术，如何才能使范本传之久远呢？在当时碑刻盛行的情况下，刻经于石，就成为最好的办法了。这正如《后汉书·蔡邕传》所载：“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贻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碑、议郎张驯、韩说、大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碑始立，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馀辆，填塞阡陌。”

熹平石经的内容，由于它是立于太学的范本，所以每经只刻一家章句，作为标准本，然后将诸家歧异的部分列为校记，即既推重一家为主，使有所适从，同时又不忽视各家成就，以利比较。

关于熹平石经的刻经种数，各家记载不一，有五经、六经、七经之别。据《隋书·经籍志》所载：其所刻经目为：《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种。以近代出土之残石内容证之，两者大体吻合。所以，刻七经之说是正确的。

关于熹平石经所刻石数，《历代石经考》定为六十四枚，

可备一说。

关于熹平石经的行数和字数，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推测说：“今以一碑35行、行75字计，则每石得二千六百二十五字，又汉魏石经皆两面刻字，则每碑得五千二百五十字。”现在，许景元以新出土的《尚书》残石（见《考古学报》1981年2期）为例，考得尚书石经第一石第一面的碑文，计三十五行，每行73至74字，也有76字者，与王说基本相符。于是，王国维推算的《尚书》为18650字、《周易》为24437字、《鲁诗》为40848字、《仪礼》为57111字、《春秋》为16572字、《公羊》为27583字、《论语》为15710字，共约200910字之说，是有一定根据的。

关于立经地点，记载为洛阳城南门外太学讲堂前，悉在东侧，西南东行。今洛阳城东南三十里、洛水南岸之朱圪塔村，有大量残石出土，可证即此地。后来，虽有徙石经于邺的记载，但出土实物少见，可能仅就少量完碑而言。

现存资料中，北京图书馆藏有残石和拓本两大类。石经残石计有189块，大块字多者有廿八字，小块字少者仅一字，一般多在十字以下。拓本材料，据说唐时就已开始传拓，但早已佚失，现存者均是近代出土残石的新拓本。北京图书馆藏拓本中除以本馆现存残石拓装的《熹平石经残字集拓》（二册）外，其著名者尚有以下几种：①《集拓新出汉魏石经残字》八册，周康元传拓，孙伯恒编辑，马衡序，民国十七年（1928年）出版。收集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吴兴徐森玉、鄞县马衡、潢川吴氏、胶县柯燕舲、福建陈淮生、江夏黄濬以及孙氏等八家藏石，共计约460块（其中汉石经313块、魏石经147块）1098字。②《集拓汉魏石经残字》四册，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吴宝伟（字常甫）编，收汉石经178石、魏石经10石。③《熹平石经残石集拓》二册，民国廿二年，罗振玉辑藏，收95石。④《癸酉续得熹平七经残石》，曾归罗振玉等收藏，计95石。⑤

《熹平石经残字》一册，曾为白坚等收藏，计15石。⑥《汉石经残字》二张，为于右任与文氏二家藏石之合拓本，共计二面，一面约存401字，一面约存421字，为现存最大块汉石经之一。

(2)正始石经：刻于曹魏齐王芳之正始（公元240——249年）年间，故称“正始石经”或《魏石经》。该经用古文、篆书、隶书三体写就，故又称《三体石经》。

魏正始之时，上距“熹平”不过70年左右，何以又要刻经？原因可能是：熹平所刻之经皆今文，而这时古文经盛行，并立诸学官，传今文者也多通古文，为了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所以虽距熹平石经不久，又续将古文经刊刻于石。但古文不易识，故又将篆、隶二体一并刻在下面，起注解说明的作用，因而三体并行。其三体排列的方式，有“品字式”和“直下式”二种。品字式，每石约为廿五或廿六行，每行74字左右；直下式每石为32至34行，每行约60字左右，总计约有35块碑。

正始石经刊刻的内容，一为《尚书》，二为《春秋》，三为《左氏传》（从隐公至庄公中叶止）。每石均两面刻，一面为《尚书》，一为《春秋》，与汉石经各经自为表里的情况不同。

关于书人，有卫觐（敬侯）、邯郸淳（卫觐之子）、稽康之说，其实，因刻经量大，这些人都有可能参加书写，不必拘于一人。

立石地点，为洛阳城南开阳门外，太学讲经堂前，置于堂西，北行。

北京图书馆现藏正始石经资料：①石经残石147块，大块字多者有12字，小块字少者仅1字。并拓装有残石拓本二册。②除前已涉及的两种汉魏石经集拓（见熹平石经条）外，还有《汉魏石经残石》二册，内容主要是建德周季木、吴兴徐鸿宝、江夏黄伯川、鄞县马叔平等人的藏石，并钤有“燕脣审定”等印

章。③曾为梁启超旧藏的魏三体石经尚书与春秋等残石拓片数张。④正始石经残石的裱轴两种和拓片多件。

(3)开成石经：始刻于唐文宗大和七年（公元833年），成于开成二年（公元837年），故称“开成石经”或“唐石经”，因树立雍地，故又称“雍石经”。

开成石经内容，刻《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等十二种。只刊经文，但在标题次行书有某某注。据此可证该经所采用之注本，如尚书用孔氏传本，毛诗用郑氏笺本等。十二经文之后还附刻有张参之“五经文字”和唐玄度之“九经字样”与之并行。清时贾汉复集十二经之字，又补刻《孟子》于后，凑成了十三经。

关于唐石经的石数，据统计共为227石，每石八列，每列行数不等，一般为卅余行，每行多数为10字，但也有9字或11字者。共刻文163卷，650252字。

石经书人为艾居晦、陈玠、段绛等，字体真书（标题为隶书）。刻就后，立于长安务本坊国子监太学讲经堂两廊。后在天祐（公元904—907年）年间被弃之于野，五代朱梁时，复犂入城，置于故唐尚书省之西隅。宋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迁于府学，后虽经嘉靖地震，略有残损，但基本完好，现存西安碑林。

关于开成石经的拓本，据说明时东文秀家有嘉靖乙卯（三十四年，公元1555）时的拓本，现在可见者只有清乾隆前的拓本。北京图书馆藏有梁启超旧藏的清后期整张拓片数套，以及铁琴铜剑楼旧藏、丁惠康捐赠的有关拓本。

(4)广政石经：始刻于后蜀孟昶广政元年（公元938），故称“广政石经”或“蜀石经”、“后蜀石经”，因地点在成都，故又称《成都石经》、《益都石经》。

其经始刻时，只有《孝经》、《论语》、《尔雅》、《周易》、《毛诗》、《尚书》、《仪礼》、《礼记》、《周礼》、《春秋左氏传》（只刻十七卷）等。其后宋人田况补刻《公羊传》、《谷梁传》及《左传》之十八至卅卷；席贡补刻《孟子》；晁公武补刻《古文尚书》，同时并校诸经异同，著《石经考异》，一并刊刻于石。

蜀石经的特点：一是经文和注文同刻，与过去只刻经文者大异，从而保存了大量的有价值的史料；二是历时久远，刻经时间长达186年，加上刻《考异》的时间，更长至232年，可见其工程之浩大，刻办之艰难。

该经所用底本与开成石经同。刻石确数不可考，每石行数亦不详。可知者，据“周礼”、《左传》等每石分为若干层，每层可能为十三或十四行；《公羊传》、《谷梁传》，每石若干层，每层约10至20行不等，每行之字数，大字13—16字，小字10—23字。据《石经考》估计，该经所刻字数共为1277254字。

蜀石经书人有张德钊、杨钧、孙朋吉、周德贞、张绍文、田况、席旦、彭槩等。校刊刻石者为毋昭裔。镌石者为陈德谦、武令升、张延族、陈德超等人。

经刻就后立于成都府学石经堂，南宋前期尚完好，至元明之际不知下落，现在拓本也极罕见。

该石经拓本，据说宋时有96册，明万历年间内阁大库犹存全部，清时内府藏《毛诗》半部，其余多在私人手中。

北京图书馆藏有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从香港买回来的《蜀石经》一部，系宋元拓本，是现存《蜀石经》的最佳本。这部石经拓本，计有墨拓本七册、木刻印本一册、题跋姓名录一册共计九册。其中《左传》、《谷梁传》、《周礼》各二册，《公羊传》一册，道光年间木刻《蜀石经》印本一册，《蜀石经题跋姓名录》一册。在“左传”册页上钤有“东宫书

府”等宋代的内府官印，可证该册为宋拓无疑。墨拓本中分别有清朝乾嘉时代的著名金石家翁方纲等数十人的题跋和观款，对《蜀石经》的研究提供了不少宝贵的资料，可为今天研究者参考。

(5)嘉祐石经：始刊于北宋仁宗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毕工于嘉祐元年(公元1061年)，故称“嘉祐石经”或“北宋石经”。经文用篆、真二体书写，故又称“二体石经”。经成置开封太学，故又称“开封府石经”、“国子监石经”、“汴学石经”。

书经人为杨南仲、谢颀、张次立、赵克继、章友直、胡恢等人。

所刻经数，各说不一，王应麟《玉海》引了七经之目，周密《癸辛杂谈》记了九经之数，元李师圣《修复汴学石经记》又载为六经，并加《论语》、《孝经》等为八经。马衡在《中国金石学概要下》说：“综合诸说观之，北宋石经实为九经，其目则为《易》、《书》、《诗》、《周礼》、《礼记》、《春秋》、《论语》、《孝经》、《孟子》。”清叶名礼《北宋汴学二体石经跋》亦以九经说为是。所以嘉祐石经为九经之数较为可信。

经完，置汴京太学，后经亡佚，现仅存残石而已。

该经宋时已有拓本，经各家辗转收藏，损失大半。北京图书馆现藏有多种嘉祐石经拓本均较珍贵。主要者为：①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从香港买回来的墨拓本《嘉祐石经》，共四大册。内容为《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周礼》、《孟子》等七种经。数量达379开，758页，每页8行，每行10字，共为30324字。此本即山阳丁晏于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五月在淮安书肆发现，买回重装，后归建德刘世珩、合肥李经迈等又流往香港的。丁晏收装时，还另装有名人题记一册，未和四大册一并流徙，经辗转现在存于上

海图书馆。这部北宋石经均宋元拓，大幅经摺、剡裱，极为壮观。②嘉祐石经《毛诗》残石，裱本二册，存卫风、王风、郑风、小雅甫田、大雅荡、周颂清庙、臣工等篇，明前期拓本。③嘉祐石经《尚书》残石，裱本二册，存泰誓、牧誓、武成、洪范金縢等篇。明前期拓本。④嘉祐石经《周礼》残石，裱本一册，经摺、剡裱、墨镶边，廿九开半，五十九页，每页6行，一行篆，一行楷，每行10字，首尾扉页均有陈运彰题跋和铃印，墨本中还有陈的批注。⑤嘉祐石经《毛诗》、《尚书》残石，裱本四册，计墨本97开，194页，题跋二开四页，每页五行，每行最多10字。尾有题跋二则，铃有“裕如重装印记”、“高阳崔氏金石书画章”等印章。⑥嘉祐石经《周礼》、《礼记》残石，拓片三张。为顾千里和铁琴铜剑楼旧藏，并附有陈宗彝给顾千里的未曾发表过的亲笔信一件。嘉庆道光拓本，十分珍贵。

(6)南宋石经：为南宋皇帝高宗赵构所书，故称“南宋石经”或“高宗御书石经”。绍兴十二年（公元1143年）九月，左仆射秦桧请求镌石以颁四方。

历代所刻石经均有作范本之意，但南宋石经则不同，系高宗随时习字所书。当时他曾与辅臣言：“学写字不如便写经书，不惟可以习字，又得经书不忘。”所以他写的目的，则在练字习经。

南宋石经除主要为高宗书写外，还有其妻宪圣皇后续书者。其字体也有二种：《周易》、《诗经》、《尚书》、《春秋左氏传》、《礼记》为真书；《论语》、《孟子》为行书。

南宋石经所刻诸经，虽多数都系当时太学石经之数，但《礼记》之学记、经解、中庸、儒行、大学等篇，原来并不属太学石经之数，而是在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建光尧石经阁安放石经时，从知府赵蟠老之请，搜访摹勒以补诸经之阙而列入的。总计各经所刻石，约为二百块，现仅存86碑，已不足半

数。

该经刻就后，立于临安太学首善阁及大成殿后三礼堂之廊庑。屡经变易，现残石仍在杭州。

北京图书馆藏有曾为顾千里收藏的《临安石经》之《诗经》残石拓片一套。原经十石，现存八张，缺四、五两石。嘉庆道光拓，是很少见的珍本。

(7)乾隆石经：始刻于清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0），毕工于五十九年（公元1794），故称“乾隆石经”或“清石经”。书经人蒋衡，一体真书，始写于雍正四年（公元1726），写成于乾隆二年（公元1737），乾隆五年时呈献高宗皇帝，贮于懋勤殿中，过五十年始命刊刻。

该经内容为《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十三种，加上乾隆五十六年上谕和六十年和坤表，共190石。

经刻就后，立于太学（国子监）两庑，东西各半。现已搬至孔庙西北集中保存。

经碑额题系篆书，文为：“乾隆御定石经之碑”八字。碑两面刻，每面六列，每列卅五行，每行十字，今仍完好。

北京图书馆藏有该经全套整张拓片，共计三百八十六张。

(8)其它。

儒家石经除上述七种外，尚有《周易》、《尚书》、《诗经》、《周礼》、《礼记》、《春秋》等六种经制成的“六经图”刻石，现虽只有残石存江西上饶，但其木质翻刻本仍存。从此可考知其为六石，每石两面刻，共刻三百余图（参见王敏、徐自强撰的《〈六经图〉记》，载《北图通讯》1980年3期）。现在北京图书馆仍存有《六经图》的清代翻刻本多种，可供研究参阅。

至于《孝经》等儒家石经，零星刊刻者，各地皆存一些，

不备举。

（二）宗教石经

将宗教的经书刻之于石所形成的宗教石经，包括佛教石经、道教石经两大部分。

佛教刊刻石经，始于北朝，盛于隋唐，金元以后渐衰。

佛教刻经种类有三：

（1）摩崖刻经。这种刻经的时代以北齐、北周为盛，地域以齐鲁为多，如泰山之《金刚经》，徂徕山之《大般若经》等。此外，在河南安阳宝山，河北磁县鼓山等地也有著名的佛经摩崖。可惜多在深山穷谷，传拓极为不易，故流传拓本较少。

（2）碑刻佛经。各地都有发现，但以房山县云居寺石经山刻经最为丰富。它始刻于隋代，盛行于唐、辽，终于明末，历时千余年。根据解放后1956年至1958年的全面调查发掘整理，共计划刻经约一千种左右，成石一万五千余块，分藏小西天九个洞内和一座塔下。关于塔下藏经，由于塔毁，现已移存于云居寺文物保管所的藏经库内。

这批石经，不仅数量众多内容丰富，而且还有过去从未著录过的经典，如《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唐玄宗注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等，所以它们是一批研究佛学史的重要资料。此外，在这些石经中还有大量的“石经题记”，初步统计，约有六千余则，其中仅年代明确者，就有1467条。这对各个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的研究，也有重要的价值。

北京图书馆藏有房山石经的全套整张拓片，共计一万五千余石，三万余张，可供系统参阅。

（3）经幢刻经。这种石幢刻经，主要是刻陀罗尼经，其出现的时间，可能在唐朝前期武周之世，更早者未见。

道教所刻石经，据现在所知，始于唐朝中期之《龙兴观道德经碑》（景龙二年，公元708年），比佛教刻经为晚，所刻

经数也大逊于佛教。以现在还流存者统计，约有黄帝《阴符经》、老子《道德经》以及《常清净经》、《消灾护命经》、《生天得道经》、《北方真武经》、《昇玄经》、《日用妙经》、《洞玄经》等十余种。

北京图书馆藏的道教刻经拓本，各类都有一些代表。以《道德经》为例，就有数种版本。可分二类：一为整张拓片，一为裱本。

拓片类有：①《道德经碑》二张，（景龙二年，公元708年）；②《道德经幢》8张，（开元廿年，公元732年）；③《道德经碑》4张，（景福二年，公元892年）；④《道德经》额并侧7张（至元廿八年，公元1291年）。

裱本类有：①高翻书《道德经》二册（元至元廿八年，公元1291年）。②顾信书《道德经》一册（元延祐五年，公元1318年），为赵孟頫书《道德经》的摹本，章钰旧藏，明拓本。经摺、剞裱，小字楷书，每页七行，每行字数，满者20。③高翻书《道德经》四册，陈准生旧藏，明拓本。尾题跋云：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贾三鉴购得，曲阳举人张耀先（字思孝）重装。经摺，剞表。墨本为112开224页，题字为1页，共225页，每页4行，是一个极为珍贵的版本。

关于佛数道教刻经的异同，叶昌炽在《语石》（卷四）中有很好的说明：释经之精者皆大字，而碑为多；道经之精者皆小楷，而帖为多。这是一个很恰当的概括。

（执笔人：徐自强）